

苏美冷战的国际政治经济互动:古巴问题分析

邱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102)

[摘要] 在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下,美、苏综合利用政治和经济等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尤其随着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手段成为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古巴是美国的近邻,革命后的古巴是苏联唯一能对美国近距离地制造麻烦的盟友。苏美两国在古巴问题上的表现,为我们分析两国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争夺世界霸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键词] 冷战; 苏美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 古巴危机

[中图分类号] D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0)03-0067-04

苏联和美国的对抗是20世纪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历史事实。本文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视角来看待苏美冷战,并选取古巴问题为特殊视角,对苏美在争夺古巴和在古巴危机中的对政治经济手段的运用作一粗浅分析。

一、苏美由政治对抗为主发展到政治、经济的全面竞争

二战结束前后,出于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考虑,以及战后国家遭受的创伤需要时间恢复等原因,苏美两国都有意在已奠定扎实基础的政治军事合作上进行更为稳固的合作,但他们的打算却背道而驰。罗斯福的理想主义愿望是通过美国主导创建的联合国来规范苏联的行为,使之成为一个“组织内”的可以合作的、行为更具有预测性的成员;而斯大林的现实主义的考虑是如何巩固来之不易的安全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加上二战胜利带来的自信和东欧亲苏政权的建立,也使其对建立联合国的态度不如罗斯

福那么热心。苏美两国维持大国合作愿望的真正动机是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并非为了纯粹的共同维护和平。另外,两国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对立更使得苏美政治对抗不可逆转。丘吉尔的演说、凯南的报告、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与苏联在希腊、土耳其的行动、斯大林对选民的讲话及对东欧国家政治走向的控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对立的立场。伴随着敏感的德国问题而相继成立的北约和华约两大对抗性军事集团使得战后不可调和的苏美政治军事对抗基本定型。战后初期发生的美国经济援欧的马歇尔计划和苏联控制东欧经济的莫洛托夫计划等经济事件,都是依附在政治对抗下的,由政治对抗主导而发生的。在斯大林看来,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美国慷慨大方的表现,而是一个经济大锤,它被用来破坏东欧作为苏联安全缓冲区的地位。^{[1] (P.181)} 苏联认为美国邀请其加入该计划的目的是控制苏联。

但随着两大各自为营的经济体制的建立,苏美由政治对抗开始发展到政治经济模式的全面对抗。美国核垄断的被打破以及苏美为获取核优势而展开的核竞赛迫使两个超级大国把经济资源的很大一部

分投入到核战略上,这就需要发展强大的经济以支撑安全需求。苏美加强了各自集团内部的经济联系,而基本上排斥东西方国家间的经济往来。于是两国更加注重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取经济资源。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使得经济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起来:一是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瓦解,二是石油危机。这两个事件促使美苏在全球争霸战略中从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并举,发展到更加突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看似是纯粹的经济事件却对两国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石油危机,阿拉伯国家运用经济资源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迫使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中东的政策有所改变,苏美两国的对外政策从此更加强对石油等经济战略资源的抢占,这也是导致苏联于70年代末入侵阿富汗的深层原因。经济上取得成就的国家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尼克松总统就不再认为国际事务由苏美两家说了算,而认为形成了还包括日本、欧盟和中国在内的五大力量中心,而其中的日本和欧盟是典型的经济力量中心。在对苏关系上,经历了越战的美国需要修整,尼克松政府以缓和为手段追求遏制的目标,他在打开对华关系从而在亚洲形成对苏战略牵制的同时,扩大美苏间的贸易,使得美苏关系中既有胡萝卜,也有大棒。

[1] (P 192) 政治和经济手段双管齐下。80年代,里根政府更是制定了详细的故意给苏联提供错误的对苏禁止出口的高科技设备的数据、往苏联经济齿轮上撒沙子的计划,目的就是拖垮苏联经济,促使其政治变革。里根政府在美苏关系中把利用经济手段来影响苏联政治的做法演绎得最为成功。

政治影响着经济,经济也作用于政治。怀特曾经说过,“政治可以成为经济的工具,而经济也可成为政治的工具”。[2] (P 239) 即使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美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两国也不忘既利用政治手段来获得经济利益,也利用经济手段来获得政治利益,很多时候政治的讨价还价和经济的讨价还价是融合在一起的,尤其表现在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当中。这里以苏美对革命后的古巴的争夺及古巴导弹危机为例,来说明两国如何运用政治经济手段来获得博弈的最大利益。

二、苏美冷战之古巴事件

古巴革命前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为了获得美国对其独裁暴政的支持,几乎把古巴的经济主导权允让给了美国的商界机构,其中包括几乎全部的石油生产、大部分的公共设施、一半的铁路以及40%的蔗糖生产。[3] (P 131) 古巴革命后,卡斯特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打击有组织犯罪、降低文盲率、提高古巴人民的住房和医疗水平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旨在重新分地给农民和结束外国势力对古巴经济进行控制的农业改革计划,这就直接触动了美国在古巴的商业利益,并被认为是美国在整个拉丁美洲利益的威胁。到了1959年底,古巴政府采取行动把古巴的私人企业和外国财产国有化。这使得艾森豪威尔认为卡斯特罗要么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要么就是受到共产主义分子的影响。而此时的卡斯特的改革动机只是为了恢复古巴经济,他还远远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可是在美国拒绝给古巴经济援助后,苏联抓住机会,在苏联副总理米高扬于1960年2月访古期间与古巴签订了经济协议。[3] (P 132) 当年3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古巴流亡者袭击古巴并在古巴发动起义的计划。[3] (P 132) 在得到来自古巴流亡者中的间谍反映的情报后,卡斯特罗立即采取了反美亲苏的立场。曾任美国驻古大使的邦萨尔坦白地承认,卡斯特罗“1959年的胜利是激进的、纯粹民族主义的;他之所以转而依赖苏联,完全是由于美国1960年春季的行动,使得苏联人除了挽救卡斯特罗之外,别无选择”。[4] (P 67) 6月,在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拒绝为古巴从苏联进口的原油进行提炼后,卡斯特罗把它们提炼厂收归国有。古巴还和苏联签订了一项经济援助协定,与许多东欧国家签订了武器协议。到1960年夏末,苏联集团已经成为古巴经济和军事的主要支持者。

艾森豪威尔对卡斯特的行动做出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就是给古巴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当年7月,时值卡斯特罗正对古巴境内剩余的美国资本进行没收或征用,艾森豪威尔把当年古巴蔗糖的配额

减少了70万吨。不久,他完全禁止1961年头三个月古巴蔗糖进入美国市场,而这一经济制裁措施也被后来的肯尼迪所使用。^{[4] (P.67)}9月30日,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去古巴旅行,并敦促居住在古巴的美国人把他们的家眷送回美国。10月,艾森豪威尔对古巴实行全面出口禁运(除了医疗和其他应急供应品)。美国政府还在美国占领的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周围布雷,宣称美国决不允许古巴夺回这个基地。^{[4] (P.133)}古巴予以还击,对古巴境内所有剩余的美资企业进行国有化,并向苏联进一步靠拢。1961年1月,美国和古巴断交。古巴由此成为苏联在美国后院制造紧张的前沿阵地,也为之后的导弹危机埋下了伏笔。

艾森豪威尔提议的入侵古巴的计划最终由肯尼迪于1961年4月17日付诸行动,即猪湾入侵。可由于肯尼迪最终拒绝美国军事力量直接参与行动,这次入侵仅仅三天便遭到惨败,大约1189名入侵者投降后被关押至来年的12月。肯尼迪采取经济手段换取政治利益,他用价值5300万的拖拉机及其他古巴急需设备换取了这些俘虏的释放。猪湾事件使得卡斯特罗更加靠近苏联,他本人更是明确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以此确保古巴继续得到苏联的保护。而肯尼迪上任后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第一场争夺的失败使其蒙羞,他加大了推翻卡斯特罗的力度,其中包括批准了一项中央情报局起草的破坏古巴经济的计划(猫鼬行动)。为了阻止再次发生美国支持的对古巴的入侵行动,也出于抵消美国核优势的考虑,以及平衡由于肯尼迪迅速扩充美国的核武库而给苏联本土带来的不断增强的威胁,赫鲁晓夫决定于1962年初在古巴部署36枚射程为1000海里的中程弹道导弹和24枚射程为2200海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既然美国在苏联的邻国土耳其已经部署了对外宣称是为了防御目的的木星中程弹道导弹,赫鲁晓夫就毫无顾忌地试图在美国后院的古巴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3] (P.142)}如果苏联成功在古巴部署导弹,除了能巩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因为这个地位正遭到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挑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即期望转移公众对赫鲁晓夫的国内经济业绩

表示怀疑尤其是对农业方面的批评的视线。

肯尼迪由于猪湾行动的失败备受国内舆论的压力,加之其在柏林墙事件中的无所作为而受到指责,于是肯尼迪把古巴导弹危机视为对自己执政能力的一次个人考验。他曾对他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说如果自己不迫使苏联撤走导弹的话,就会受到弹劾。在10月14日美国U-2侦察机发现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后,肯尼迪决定迫使赫鲁晓夫让步。从全球战略考虑,在美国有着明显核优势的情况下,他当然不允许苏联取得和美国的战略平衡,因此肯尼迪从一开始就拒绝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这一危机。他采取对古巴进行海上隔离和封锁的措施,并下令军队做好打核战的准备。156枚中程弹道导弹处于待发状态,战略空军的B-47和B-52轰炸机处于警戒状态,^{[3] (P.143)}核大战处于一触即发的危险之中。赫鲁晓夫考虑到苏联核力量处于劣势,要是危机升级为和美国进行全面核战争的话,苏联必输无疑,最终于10月28日同意撤走苏联导弹;肯尼迪则公开表示美国不会对古巴再次入侵。政治上的讨价还价给赫鲁晓夫多少挽回了点面子,而肯尼迪由于捍卫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受到了举国上下的赞誉,也扫除了猪湾事件带来的羞辱。

但古巴导弹危机给两国和国际形势都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赫鲁晓夫由于这次行动的失败而促使他于1964年10月下台,虽然赫鲁晓夫对这次危机的处理不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但这一因素肯定起了作用。^{[5] (P.272-273)}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决心避免受到类似的羞辱,开始大肆扩充核武库,到60年代末时,苏联已经和美国达到了大致的核平衡。苏联利用一系列和欧洲国家的缓和措施来获得更多的经济交往机会。但由于把不成比例的国家收入用于扩充军备,使得苏联其他部门的发展和改革缺少资金,导致了苏联经济问题积重难返,预示并最终导致苏东集团的动乱、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消失和全球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而肯尼迪的胜利也多少助长了他对战胜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过于自负的心理,这也促使美国渐渐陷入了让其付出惨重代价的越南战争,遭受到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损失;加上美国对西欧和日本等同盟国的军事保

护耗资巨大,这也使得西欧和日本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并于70年代成为与美国竞争的经济体,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领导地位受到挑战。从这方面说,苏联和美国因为这样一个事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成了输家,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古巴导弹危机带来的核战争一触即发的险情给两国领导人和全世界都以极大的震撼。对核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灾难的认识,加上经济上的考虑以及受到来自国内外反核运动高涨的压力,使得苏美两国开始了预防核战争的合作和军备控制的谈判。比如,1963年6月苏美签订“热线”协议,目的是为了减少意外核战争的危险,也为了减缓国际危机的紧张局势;当年10月11日《有限核禁试条约》生效,这是冷战期间美苏达成的第一个重要的核军备控制协议;在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苏美签订了《核不扩散条约》等等。这些古巴危机后的成果给国际关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三、结论

在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国际政治框架制度决定国际经济利益分配。国际经济体制的各种制度和运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政治体制,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要受到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因素的制约。冷战期间国际政治框架制度是典型的两极对抗型政治制度,这就决定了国际经济制度也是分裂的,大体分裂为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制度和东方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制度。但分裂并不代表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完全对立没有互动,相反,在冷战期间苏美两国在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对抗中,两国在各领域进行了交往,达成了一些共识,利用政治或经济的手段来获得经济或政治的利益的做法十分常见,尤其表现在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军事对抗过程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的迫切性是加剧或减缓冲突的主要因素,这在美苏对外政策中多有体现,如为了石油利益,两个超级大国对待中东阿拉伯的政策变得更为灵活务实,也缓和了激烈的阿以冲突。一国的外交政策是服务于一国的国家利益的,服务于它的政治和经济。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一国的对外政策决定过程中的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是相互影响的。经济制裁和禁运是国际政治斗争中常用的手段;降低或提高关税、主张或反对贸易保护主要是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更是实现某种政治军事战略的手段。而另一方面,国家也积极采取一切可能的政治手段来保证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如美国对古巴革命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政治支持换来的就是对古巴经济的掠夺,这是冷战中美国对待第三世界国家比较常用的做法。应该说,冷战中苏联和美国采取了政治和经济等综合的手段来谋求全球优势。

国际政治经济联系的紧密性也可以从国际关系学者们对“高级政治”(主权、领土、军事安全、外交等)和“低级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划分中看出。可以说,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对财富的夺取成为国家政治利益的现实保障,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就没有强大的军事建设,就没有政治改革的资金来源,也就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政府的支持,那么就会给政治体制带来动荡。

[参考文献]

- [1] [美]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 张小明.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2] Quincy Wright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Crofts 1995
- [3] Ronald E. Powaski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4] Philip W. Bonsai Cuba Castro and the United States [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1.
- [5] Vladislav Martinovich Zubok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责任编辑 齐琳)